

人口学综合

2012 ~ 2013 年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陆杰华, 李 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文章系统性地回顾和评述了2012年和2013年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现状与主要进展。通过检索与回顾2012年和2013年国内主要人口学刊物上较有代表性的人口学论著, 得出2012年和2013年我国人口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集中在生育、人口与经济、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人口普查数据和方法、其他专题等方面。

关键词: 2012年; 2013年; 中国; 人口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4) 03-0031-11

Review and Observation on China's Demography Research of 2012 and 2013

LU Jiehua, LI Yu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systematic review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major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graphy.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related papers on China's major demographic journals and related books in 2012 and 2013, we concluded that the demography research in the past year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economy, ageing, migrant, discussion of census data and methods, etc.

Keywords: 2012; 2013; China; demographic study

2012年和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年份。党的十八大在2012年11月胜利召开, 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一年后, 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召开, 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 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必将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着两次关键会议的召开, 我国人口学界也迎来两个牵动人心的重大现实

收稿日期: 2013-12-03; 修订日期: 2014-03-20

作者简介: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转变。一是2013年初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意味着成立了32年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结束了其独立存在。二是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标志着我国实施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首次实现了可喜的重大调整。两年间,我国人口发展方面也展现出很多新情况、新特点,诸如家庭发展等新话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人口学界跨入了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历史新起点。因而梳理近两年人口学界的研究成果、把握人口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整体来看,2012年和2013年我国人口学研究集中在生育、人口与经济、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人口普查数据和方法及其他等领域^①,其中前四个专题也是以往学界关注的重点。

一、生育专题研究

整体来看,生育专题延续了以往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生育政策、生育水平等方面。由于2012年和2013年正处于我国生育政策正式调整前的窗口期,有关生育政策的研究显得尤为令人瞩目。

1. 生育政策

2012年和2013年是我国生育政策正式调整前研究、筹划的重要两年,无论是政府部门、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大众,对我国生育政策的关注度都显著提升。迄今,多数人口学者已达成共识,即我国已处于较低生育水平,而对于是否放开生育政策,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放开之后是否会出现大幅度生育反弹,因而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成为研究重点。综合相关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全国生育率总体处于深度低水平且稳中有降的状态,实际生育水平降至政策生育率后并不会保持而是会继续下降^[1];目前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虽然二孩生育目标占绝对优势,但潜在二孩生育的比例不到50%^[2];计算得到的中国2012年平均意愿生育水平为1.86,从长期看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将趋近于1.80左右^[3]。此外,李建新等对江苏省六县市的研究显示,这些地区不受政策约束的育龄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并未达到理想或意愿生育水平,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升、工作压力等都对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4]。整体来看,较多研究都支持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生育水平也不会出现大幅反弹。还有学者从公共政策视角分析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执行40多年后已逐渐显现出一系列不良后果,对其他公共政策需求压力增大,带来一系列较高的执行成本^[5]。此外,有学者还研究了不同政策下“单独”育龄妇女的未来变动趋势,对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具有重大意义^[6]。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都论证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值得再做深思。徐行等的研究指出目前是由于育龄妇女将生育行为推迟才导致了我国很低的生育水平,不应据此作出调整生育政策的决定^[7]。韦艳等对“农村二孩”试点之一的山西省翼城的分析也表明,翼城现有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仍然更多是政策干预的结果,而非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低生育意愿的内生性转变^[8]。虽然仍存在一定争议,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已迈出了第一步,启动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并指出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最终确定。这一点充分考虑到了我国地域广阔,人口情况复杂的现实。那么我国生育水平到底将会如何发展呢?这仍有待未来我国实践情况的验证。

在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无疑是引人关注的大事。那么对于这一政府机构调整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一调整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新的机构在计生工作上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对于这些问题,周长洪撰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9]。此外,姚义贤等还基于大部制改革的背景,

^① 本文主要对2012年和2013年国内几个主要人口学核心期刊作了文献检索,包括《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人口学刊》、《人口与发展》、《西北人口》、《南方人口》,以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人口学》等。

以全新视角深度剖析了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10]。

2. 生育水平和生育分析方法

出于对普查数据质量的质疑, 我国的真实生育水平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对“六普”数据的深入分析, 一些学者据此对我国真实生育水平进行了考察。李汉东等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认为, 我国 2000 年以来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明显偏低, 文章估计得到 2000 ~ 2010 年我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为 1.57 左右^[11]。但郭志刚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看法, 他认为“六普”数据显示的低生育水平不能简单归结为生育漏报, 这一极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孩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 这一现象是由于居住在农村的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未婚比例提高导致的^[12]。巫锡炜从长时期角度分析我国低生育率出现的机制也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郭志刚的观点, 文章从生育推迟角度分析了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低生育率的出现, 指出少生和晚育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两大人口学机制^[13]。虽然各界对真实总和生育率争论不一,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已经处于持续的低生育水平状态, 这也将是未来很长时期我国面临的生育现实。

对生育分析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进展。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是近年来关注度十分高的一种生育分析指标, 它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容易受到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缺点而提出的。自提出以来, 这一指标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讨论和各种新的尝试。例如, 有学者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分析表明, 该指标核心调整公式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计算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调整指标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等现象^[14]。但作为对常规时期指标的改进, 这一方法仍有其重要的应用价值。郭志刚梳理了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学者们在这一研究上的理论争论, 介绍了方法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还特别介绍了邦戈茨 (Bongaarts) 和索博特卡 (Sobotka) 的最新进展^[15], 这对于促进生育分析方法的改进有明显的意义。

3. 出生性别比

2012 年和 2013 年, 针对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不像以往那么集中。其中, 胡耀岭等基于空间数据, 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实证研究了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16]。宋健等则注意到当前我国出现性别偏好内容多元化的特点, 且存在性别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17]。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多年来始终困扰着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值得欣慰的是, 王钦池指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 在继续加强治理的条件下,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18], 表明未来我国出生性别比走势可能会较为乐观。

二、人口与经济专题研究

人口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而我国无论在人口总量、劳动力供给还是人口流动等方面都呈现出快速变化的图景, 把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劳动供给与就业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有诸多讨论, 这一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张车伟等分析认为我国无限劳动供给时代已经结束。当前我国实际失业率水平仍较高,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19]。对于就业市场矛盾现象的产生机制, 翟振武等认为这是由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模式为主的经济发展与生育率降低、劳动者素质上升的社会现实相脱节^[20]; 而蔡昉等则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就业的非农化趋势快于雇员化, 导致了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只能从事自雇职业^[21]。虽然关注了劳动力供给的两个不同群体, 但两位学者的观点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我国劳动力素质与经济

发展方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尹文耀等从当代分性别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参与水平和模式变动趋势的研究别具特色,指出当代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整体呈下降趋势^[22]。沈可等则选取了家庭这一崭新视角研究劳动供给问题,发现多代同堂家庭模式的淡化成为女性劳动参与的一种重要不利因素^[23]。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结构性矛盾将是制约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关键,且劳动供给与就业还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能力。

2.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

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是讨论的热点。首先,齐明珠讨论了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24]。李猛则探讨了中国经济的减速之源,认为中国经济减速90%的原因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来解释^[25]。这些研究为我们思考劳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人口城乡迁移的经济效应也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逯进等研究指出二元人口迁移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26]。王婷等关注了我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影响,指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总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7]。此外,于潇等证明了迁入人口数和就业人数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28]。可见,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我国较大的区域差异呢?对此,张车伟等指出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由经济聚集度变化所决定,人口聚集度变化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同时还指出中国区域差距自2003年后已经呈现收敛趋势^[29]。肖周燕采用更为细致的地市区域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是经济聚集远超前于人口集中,但东、中、西部地区有所不同;并指出我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和空间依赖^[30]。未来我国人口变化必将呈现更为多样化的特征,洞悉和把握这些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三、人口老龄化专题研究

2012年和2013年,人口老龄化问题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除在老年生活状况、养老模式等传统领域实现一定突破外,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讨论。

1. 老年生活状况

两年中在老年人生活状况领域涌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文献,学者们采用多种分析方法和模型对我国老龄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我国老龄化发展分析方面,黄匡时等通过计算虚弱指数随着年龄的变化率来估算老人个体老化率,发现我国高龄老年人个体的老化率高度收敛于其平均值^[31]。贾云竹等指出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老龄人口中的女性比例低于世界多数国家的水平,但在未来我国老年人口的女性化程度将逐步加深^[32]。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全面认识我国老龄化压力的重要资料。杜鹃利用“六普”中的自评健康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和地区差异、婚姻状况差异进行了全面分析,为我们勾勒出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基本情况^[33]。那么老年人中处于不健康阶段的群体具有哪些特点呢?杨贞贞等的研究表明,60~97岁老年人的不健康阶段主要为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状态,而97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为生活不能自理状态^[34]。老年人口自杀问题近年来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王武林指出老年人口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其中男性老人、农村老人和高龄老人是高自杀风险的群体^[35]。黄润龙等也对1987~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自杀死亡的趋势、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做了分析^[36]。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口自杀现象将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值得我们深思。此外,朱荟等考察了宗教参与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

响机制, 结果表明宗教参与对死亡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控制其他因素则会削弱这种影响^[37]。

2. 养老模式

首先, 邬沧萍和杜鹃等从宏观视角出发, 集中论述了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有关老年人生存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 并详细论述了各个养老助老主体的社会责任^[38]。“四二一”家庭结构假设被广泛使用, 以说明和探讨家庭养老压力问题。然而, 陈雯通过建立“长时距”和“短时距”的家庭生命历程, 论证了在现实情况来看, 很少出现“四二一”理论假设当中所谓的“沉重的负担”^[39], 让我们对此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谈及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时, 子女的孝顺情况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对此, 杜鹃等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其研究表明 2000 ~ 2010 年我国老年人对子女孝顺程度的总体评价越来越好, 有女儿且子女数较少的老人对子女的孝顺评价更好^[40]。两年来, 对于养老保障的研究虽然相对较少, 但也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李绍泰从索洛模型推导出合理养老水平系数模型, 发现我国的合理养老水平系数在不断降低, 老年人实际保障水平在降低^[41]。刘柏惠等则利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集中指数 (CI) 方法测量和分解了中国老年人在社会照料和医疗服务使用中的非均等性, 并研究了造成这种不均等的主要因素^[42]。

3. “失独”家庭养老及其他

这一期间涌现了一些针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徐俊等对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面临的风险和困境进行了探讨^[43],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与此相比, “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更是关注的焦点。其中, 王广州估计 2010 年全国累积死亡独生子女超过 100 万, 预计每年新增死亡独生子女的总量将由目前的 9.5 万上升到 2050 年的 56 万左右^[44]; 周伟等估计截至 2010 年全国共有“失独”家庭 241 万户^[45]; 而根据陈恩的估计, 2010 年我国广义“失独”家庭数量为 851.7 万, 狭义“失独”家庭数量至少在 63.5 万以上^[46]。对比发现三者对“失独”家庭的估计存在巨大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测算方法导致的。虽然对于规模估计存在差异, 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措施存在支持力度偏弱、覆盖程度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未来如何保障“失独”父母的养老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当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仍较为有限, 未来需要学者们展开更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还有学者在老年问题的分析方法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郭震威等认为按照传统方法度量人口老龄化, 不能反映人口期望寿命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提出从期望余寿的角度界定“前瞻年龄”和老龄人口这一新的测量方法^[47]。姚远等认为在已有研究中, 对老年群体的研究重点依然是老年人数量和人口结构, 对此, 作者提出了新的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48]。另外,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生长的代表性文献相对较少, 只有王立军等研究了老龄化带给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冲击, 表明尽管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不可逆转, 但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会弱化或延缓这一趋势^[49]。

四、流动人口专题研究

2012 年和 2013 年流动人口专题延续了以往的研究态势, 针对流动人口在生存、生活和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50], 学者们展开了众多深刻且富有成效的讨论。

1.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两年来, 学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很多探讨, 突出了当前人们对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高度关注。现状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学者们发现当前我国青年乡 - 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是最低的, 处于三重弱势地位^[51]; 当前已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了身份认同,

但流动人口的内心认同要远低于认同愿望^[52]；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三个群体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差异^[53]；宋月萍等的研究更是明确指出了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所持的矛盾态度：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整体价值持较为一致的认可和接纳意愿，但对流动人口在日常交往中仍持疏离甚至排斥的态度^[54]。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方面，王胜今等以吉林为例的研究表明，宏观制度设置与个体行动参与两个方面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55]。王玉君的研究表明，城市归属感在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56]。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见，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融合现状并不乐观，流动人口市民化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也引起学者的重视。周皓的分析显示，社会融合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充分的亲子交流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家庭环境建设与家庭教育方式的改进^[57]。此外，刘传江等特别关注了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发现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行动存在着不一致性，政府行为选择对其行为有显著影响^[58]。

2. 人口城镇化

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对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很多学者保持了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首先，针对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问题，田雪原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已步入“以大为”的第二阶段，如果继续沿用“城镇化”的概念便脱离了现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会带来弊害^[59]。俞宪忠也认为中国只能选择“城市化”，但他主张应选择中小型城市化战略^[60]。可见学者们对我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仍存在一定争议，我国城镇化的方向到底应如何还期待更多的讨论。其次，很多学者指出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王桂新重点指出我国长期实施的优先发展小城镇及中小城市的战略，违背城市化规律，弱化了城市化效应^[61]。辜胜祖等认为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偏重于物的城镇化，而忽视人的城镇化问题^[62]。李爱民则侧重研究了我国的“半城镇化”问题，指出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63]。蔡秀云等也指出我国存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问题^[64]。童玉芬等则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特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65]。此外，对于我国城镇化率的真实水平学界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如段成荣等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数据存在虚高问题，经过重新评估得到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约为41.6%^[66]；但朱宇却认为我国现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基本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城乡划分原则和标准，并不存在高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现象^[67]。综合学者们的讨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肯定城镇化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未来我国应着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避免城镇化带来的弊端。

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机制，王伟进等发现中国各地级市间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且城市化的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也存在空间依赖，可能构成城市化水平空间聚集的内在要素^[68]。张车伟等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分布正在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大城市人口规模仍显不足^[69]。罗淳等根据2000~2010年数据，将“镇人口”分离出来，视为小城镇人口，指出“镇人口”对中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接近40%^[70]。这些研究对于认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机制大有裨益，未来我国仍将处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仍期待更多针对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的探讨。

3. 人口流动行为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流动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王桂新等对比“五普”和“六普”数据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

化^[71]。曾明星等则认为总体上区域人口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空间格局向“多中心聚集”方向发展^[72]。而田成诗等的研究则表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日趋扩大且分布呈集聚性^[73]。可见,学者们对此并未达成共识,未来学界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流动人口家庭化是我国人口流动的一个新趋势,张航空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是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74]。但杨菊华等指出,当前对于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研究及相关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且多采用地方性数据也使研究缺乏普适性。作者对几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对人口流动模式进行了分析^[75]。

4. 流动人口生存及婚育状况

这一期间流动人口研究更加关注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齐亚强等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76];牛建林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指出城乡流动经历对流动者健康状况存在损耗效应,且城乡流动现象的选择机制会给农村地区带来很多不利影响^[77]。可见,流动人口仍处于较为不利的生存环境中,应进一步引起人们的重视。此外,仁义科等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关系对农民身心健康的影响^[78]。流动人口的婚育观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宋月萍等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行为出现很多不同于老一代流动人口的新特征^[79],为我们深入认识新生代流动人口婚育观念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也开始将视角转向流出地,段成荣等利用“六普”数据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并重点分析农村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家庭照料状况等^[80]。牛建林的研究则发现农村地区同龄人外出务工现象对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辍学具有吸引和示范作用,而家人外出有助于降低其辍学的风险^[81]。

五、对人口普查数据和方法的讨论

在2012年和2013年涌现出很多对于“六普”数据质量以及普查方法的讨论。崔红艳等研究表明,“六普”登记的0~9岁人口和20~45岁人口数据偏差较大,其余年龄组完整性较高;妇女生育水平明显偏低;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等^[82]。王金营等的研究得到“六普”的年龄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1%,合计误差率为1.299%^[83]。但两位学者同时也都指出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要好于2000年。胡耀玲等对近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一致性进行了检验,发现九成以上队列出现正偏离,对相邻两次普查依次进行比较,人口偏离量和偏离率均呈上升趋势,且1982~2000年出生队列人口偏离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84]。王金营对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0~4岁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数据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并重新计算得到了我国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出生预期寿命^[85]。黄荣清等则通过多个方面的分析表明,“六普”的婴儿死亡数据存在十分明显的“漏报”,修正后得出全国婴儿死亡率为17.27‰,普查的漏报水平达到78%^[86]。这些研究充分发挥了人口分析技术的优势,对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应用具有良好的价值。

学者们还对普查方法进行了一些探讨。大量的流动人口是困扰我国人口普查的重大难题,为了解决在“五普”中突出的人口漏报问题,“六普”采取了“见人就登”的方式和现住地与户籍地同时登记的原则。不过,翟振武等指出这却导致了重复登记状况的出现。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析认为我国身份证号码具有天然优势,建议将身份证号码纳入以后的人口普查问卷^[87]。迄今为止,双系统估计量是普遍用于估计人口普查中实际人口数和人口普查覆盖误差的方法。但胡桂华指出这一方法存在交互作用偏差的问题,从而影响估计质量,作者依据对数线性模型和最大似然估计量构造了三系统模型,以期能够使这一问题有所改进^[88]。

六、其他专题研究

1. 家庭发展

当前,我国的家庭在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家庭发展问题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针对家庭发展政策的调整,胡湛等指出我国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对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提出未来我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89]。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是家庭的基础,陆杰华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婚姻状况在过去20年间正处于嬗变的历史时期,无论是结婚状况、离婚状况,还是分性别、城乡平均初婚年龄以及分年龄婚姻状况都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特征^[90]。韦艳等指出虽然初婚率下降和峰值年龄有所推迟,但我国仍属于普婚型社会,且我国初婚模式的性别差异正逐渐缩小^[91]。此外,也有学者从家庭角度出发探究具体问题,如王芳等研究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儿童健康的影响^[92]。未来我国家庭仍将处于深刻变化的时期,会有更多的学者展开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2. 人口与环境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依然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且学者们多集中于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探讨。李国志等研究了人口数量和居民消费对我国CO₂排放的动态影响^[93],王芳等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探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94]。前者发现二者对CO₂排放均有显著影响;后者的研究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正U形的特点。也有的学者认为人口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不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肖周燕验证了在短时期内,人口增长对CO₂排放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对CO₂排放影响更为重要^[95]。杨文芳等发现从长期来看,人口总量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最大,短期来看,能源强度和人均GDP影响较大^[96]。

引入家庭因素是这一期间人口与环境专题研究的一个亮点。曲如晓等的研究表明家庭户规模对CO₂排放有显著负向影响^[97]。肖周燕重点关注了家庭动态变化对CO₂排放的影响,指出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家庭化为视角来研究人口因素对CO₂排放的影响更为重要^[98]。

3. 人口基本公共服务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方面,张晓岚等研究了人口因素对我国区域公共医疗服务效率的动态影响^[99];秦立建等关注了失地对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影响^[100]。翟振武等则回顾了60多年中国人口发展历史,描绘了人口变迁所折射的民生改善进程,客观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变迁和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101]。这些研究均紧贴民生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学者们也对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意义的研究。刘爽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含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102]。李洪斌分析发现“八五”、“十五”期间婴儿死亡率平均下降的绝对量较大,文章预测,中国婴儿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并将从快速下降向缓慢下降转型^[103]。吴彩霞等从借贷网络视角考察农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状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04]。对性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富晓星等对于近年来男性性服务者这一地下性产业中的新兴群体进行了研究^[105],丰富了学界的探索空间。叶文振等则探讨了中国人口科学国际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发展大有裨益^[106]。

七、总结

纵观2012年和2013年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更加贴近民生问题的研究。从对生育政策的热烈讨论,到对“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流动人口问题多维

度的研究等,都展现出我国人口学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二是研究视角有所深化。2012年和2013年人口学界对老年人生活状况、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人口城镇化等传统问题的研究都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对人口普查的讨论也具有积极意义。三是更加关注我国人口形势发展与经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在2012年和2013年,劳动力供给、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家庭发展问题等都是人口学界关注的重点。不过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人口学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如研究视野有待扩展,与国际人口学对话不足,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比较薄弱等。

当前,我国处于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逐渐下降,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些转变必将对我国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着眼未来,人口学正面临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但同时也是肩负重要挑战的时期,只有不断提高学科建设水平,提升研究创新能力,才能为我国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展望未来人口学的发展,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劳动供给与就业、老龄化的影响机理、人口城镇化以及从家庭视角对人口问题的研究等有可能会成为人口学探讨、研究的重点领域。

参考文献:

- [1] 尹文耀,姚引妹,李芬.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J]. 人口学, 2013, (3).
- [2] 王广州,张丽萍. 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国人的政策生育潜力估计 [J]. 人口学, 2013, (5).
- [3] 王军,王广州.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4).
- [4] 李建新,彭云亮.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J]. 人口与经济, 2012, (4).
- [5] 王金营,赵贝宁. 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视角 [J]. 人口学刊, 2012, (4).
- [6] 王广州. “单独”育龄妇女总量、结构及变动趋势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3).
- [7] 徐行,梁海艳.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J]. 南方人口, 2013, (3).
- [8] 韦艳,张力. “发展型”或“政策型”生育率下降——基于翼城“农村二孩”试点的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2, (6).
- [9] 周长洪. 国家人口计生委被合并与生育政策调整 [J]. 人口与发展, 2013, (2).
- [10] 姚义贤,苏建明,夏鸣. 大部制改革视域下计划生育工作思路探析 [J]. 人口研究, 2013, (6).
- [11] 李汉东,李流. 中国2000年以来生育水平估计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5).
- [12] 郭志刚.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处——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2).
- [13] 巫锡炜. 中国步入低生育率(1980~2000)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4] 郝娟,邱长溶.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检验与讨论 [J]. 人口研究, 2012, (3).
- [15] 郭志刚. 常规时期生育率失真问题及调整方法的新进展 [J]. 人口研究, 2012, (5).
- [16] 胡耀岭,原新. 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 [J]. 人口学刊, 2012, (5).
- [17] 宋健,陶椰.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 ——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J]. 人口学刊, 2012, (5).
- [18] 王钦池.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J]. 人口学刊, 2012, (3).
- [19] 张车伟,蔡翼飞. 中国劳动供求态势变化、问题与对策 [J]. 人口与经济, 2012, (4).
- [20] 翟振武,赵梦晗. 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J]. 人口与经济, 2013, (1).
- [21] 蔡昉.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3——人口转变与中国经济再平衡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2] 尹文耀,白玥. 当代劳动力参与水平和模式变动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1).
- [23] 沈可,章元,鄢萍.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 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 [J]. 人口研究, 2012, (5).
- [24] 齐明珠. 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3, (6).
- [25] 李猛. 中国经济减速之源: 1952—2011年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1).
- [26] 逯进,周惠民.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3, (5).
- [27] 王婷,吕昭河. 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4).
- [28] 于潇,李袁园,雷俊一.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的比较 [J]. 人口学

- 刊, 2013, (3).
- [29] 张车伟, 蔡翼飞. 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J]. 人口研究, 2013, (6).
- [30] 肖周燕. 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空间效应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3, (5).
- [31] 黄匡时, 陆杰华, 科克·斯考特. 中国高龄老人的老化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2, (4).
- [32] 贾云竹, 谭琳.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女性化趋势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2, (3).
- [33] 杜鹃.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3, (6).
- [34] 杨贞贞. 中国老年人不健康寿命变动的分状态贡献率研究 [J]. 南方人口, 2013, (5).
- [35] 王武林. 中国老年人口自杀问题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13, (1).
- [36] 黄润龙, 刘敏. 对 1987-2010 年我国老年人口自杀死亡的研究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3, (4).
- [37] 朱荟, 陆杰华. 宗教参与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2, (1).
- [38] 邬沧萍. 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 [39] 陈雯. “四二一”家庭结构假设与家庭养老压力事实 [J]. 人口学, 2013, (6).
- [40] 杜鹃, 曲嘉瑶. 中国老年人对子女孝顺评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J]. 人口研究, 2013, (5).
- [41] 李绍泰. 人口老龄化下合理养老金支出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3, (5).
- [42] 刘柏惠, 俞卫, 窦惠恩. 老年人社会照料和医疗服务使用的不均等性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3).
- [43] 徐俊, 风笑天.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责任与风险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12, (5).
- [44] 王广州. 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1).
- [45] 周伟, 米红. 中国失独家庭规模估计及扶助标准探讨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5).
- [46] 陈恩. 全国“失独”家庭的规模估计 [J]. 人口与发展, 2013, (6).
- [47] 郭震威, 齐险峰. 人口老龄化另一种测量指标 [J]. 人口研究, 2013, (3).
- [48] 姚远, 陈响. 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3, (2).
- [49] 王立军, 马文秀.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变迁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6).
- [50]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 [51] 杨菊华. 社会排斥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 [J]. 人口研究, 2012, (5).
- [52] 李荣彬, 张丽艳.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 106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J]. 人口与经济, 2012, (4).
- [53] 郭菲, 张展新.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 三群体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2, (1).
- [54] 宋月萍, 陶椰. 融入与接纳: 互动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证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2, (3).
- [55] 王胜今, 许世存. 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的调查数据 [J]. 人口学刊, 2013, (1).
- [56] 王玉君.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十二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3, (4).
- [57] 周皓.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代际传承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1).
- [58] 刘传江, 赵颖智, 董延芳. 不一致的意愿与行动: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参与探悉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2).
- [59] 田雪原. 城镇化还是城市化 [J]. 人口学刊, 2013, (6).
- [60] 俞宪忠.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J]. 人口学刊, 2013, (6).
- [61] 王桂新. 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 [J]. 人口研究, 2013, (6).
- [62] 辜胜祖, 刘江日, 李洪斌. 中国城镇化的转型方向和配套改革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3).
- [63] 李爱民. 中国半城镇化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3, (4).
- [64] 蔡秀云, 李雪, 汤寅昊. 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发展关系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6).
- [65] 董玉芬, 武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J]. 人口与发展, 2013, (4).
- [66] 段成荣, 邹湘江.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J]. 人口研究, 2012, (2).
- [67] 朱宇. 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 国际背景下的思考 [J]. 人口研究, 2012, (2).
- [68] 王伟进, 陆杰华. 城市化水平的空间依赖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5).
- [69] 张车伟, 蔡翼飞. 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与人口合理分布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6).
- [70] 罗淳, 舒宇. 中国人口“城”“镇”化解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观测 [J]. 人口与经济, 2013, (4).
- [71] 王桂新, 潘泽翰, 陆燕秋.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J]. 中

- 国人口科学, 2012, (5).
- [72] 曾明星, 吴瑞君, 张善余. 中国人口再分布新形势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J]. 人口学刊, 2013, (5).
- [73] 田成诗, 曾宪宝. 基于“六普”数据的中国省际人口流动规律分析 [J]. 西北人口, 2013, (1).
- [74] 张航空. 流动人口带着流动意愿研究 [J]. 南方人口, 2013, (3).
- [75] 杨菊华, 陈传波.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 流动过程特征分析 [J]. 人口与发展, 2013, (3).
- [76] 齐亚强, 牛建林, 威廉·梅森, 唐纳德·特雷曼.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J]. 人口研究, 2012, (1).
- [77] 牛建林. 人口流动对中国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 [J]. 人口学, 2013, (1).
- [78] 任义科, 郝小艳, 杜海峰. 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健康的影响——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 [J]. 人口与发展, 2013, (6).
- [79] 宋月萍, 张龙龙, 段成荣. 传统、冲击与嬗变——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探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2, (6).
- [80] 段成荣, 吕利丹, 郭静, 王宗萍.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学刊, 2013, (3).
- [81] 牛建林. 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潮对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4).
- [82] 崔红艳, 徐岚, 李睿. 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 [J]. 人口研究, 2013, (1).
- [83] 王金营, 戈艳霞.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以及对以往人口变动分析校正 [J]. 人口研究, 2013, (1).
- [84] 胡耀岭, 原新. 1982-2010年期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研究——基于出生人口队列的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3, (1).
- [85] 王金营.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寿命水平和死亡模式的再估计 [J]. 人口研究, 2013, (4).
- [86] 黄荣清, 曾宪新. “六普”报告的婴儿死亡率误差和实际水平的估计 [J]. 人口研究, 2013, (2).
- [87] 翟振武, 张浣琄. 普查数据质量与调查方法——关于将身份证号码纳入普查问卷的探讨 [J]. 人口研究, 2013, (1).
- [88] 胡桂华. 人口普查质量评估的三系统模型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6).
- [89] 胡湛, 彭希哲.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J]. 人口研究, 2012, (2).
- [90] 陆杰华, 王笑非.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状况变化分析 [J]. 人口学, 2013, (4).
- [91] 韦艳, 董硕, 姜全保. 中国初婚模式变迁——基于婚姻表的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3, (2).
- [92] 王芳, 周兴. 家庭因素对中国儿童健康的影响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2, (2).
- [93] 李国志, 周明. 人口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2, (1).
- [94] 王芳, 周兴.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2).
- [95] 肖周燕. 我国人口—经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联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2, (1).
- [96] 杨文芳, 王唯薇. 人口增长、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以CO₂排放为例 [J]. 西北人口, 2012, (4).
- [97] 曲如晓, 江铨.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2, (2).
- [98] 肖周燕. 我国家庭动态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2, (1).
- [99] 张晓岚, 刘孟飞, 李强. 人口因素对公共医疗服务效率的影响——区域差异与动态变化 [J]. 南方人口, 2012, (3).
- [100] 秦立建, 蒋中一. 失地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影响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1).
- [101] 翟振武. 从人口变迁看民生发展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 [102] 刘爽, 卫银霞, 任慧.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J]. 人口研究, 2012, (1).
- [103] 李鸿斌. 中国婴儿死亡率发展趋势研究——动态数列分析法的应用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6).
- [104] 吴彩霞, 李艳, 靳小怡.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 [J]. 人口与经济, 2012, (1).
- [105] 富晓星, Lei Zhang, Eric P. F. Chow, 马铁成. 男男性服务群体的性、性网络、艾滋风险——以东北地区为例 [J]. 人口研究, 2012, (4).
- [106] 叶文振, 李静雅. 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J]. 人口研究, 2012, (2).

[责任编辑 武玉, 方志]